

文艺学新视野丛书

厦门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

俞兆平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俞兆平 著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

文艺学新视野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俞兆平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5

(文艺学新视野丛书)

ISBN 7-5615-1867-6

I. 现… II. 俞… III. 新文学运动(五四)-文学研究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30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mailto: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沙县城西后路 10 号 邮编:3655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225 千字 印数:1—2 500 册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鼓浪
学系
书术

总 序

古人有言：“学术者，人才之本也。”（颜元《习斋记余》卷一《未坠集序》）时移世易，此理犹然。鲁迅先生执教厦大国学院，重树人而弘学术，愤“死海”而思激扬，情出肺腑，言若金石。学子感奋，不憚弄潮，遂以“鼓浪”、“波艇”名其刊物，欲竞雄于风涛。斯人已逝，风范犹存。

鼓浪者，激浊扬清之谓也。语言寓褒贬，文学重美刺，艺术尚讽谏，“学术无有大小，皆期于道”（章学诚《文史通义·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自古而然。时至今日，以道为教条则迂，以道为规律则活。昌明学术，始于实践；立言助教，贵在自得。鲁迅尝论治学于厦门，力非“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致许寿裳》），精警之言，足资启迪。

笃学精进，亦鼓浪之一义。王国维论古今东西之为学，谓不能出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也。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偏，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遂而主此学而不从彼学。20世纪以还，文学与科学、史学交渗，碰撞诚难免，融合亦有缘。语言学卓然特立，贯通科、史、文而标领风骚。艺术学固自成一派，亦濡染风尚，关注声光电化，瞩目网际交流。信息如海，学术似潮。沧海无涯而人生有涯，惟不畏艰辛者能阅胜景；潮涨潮落而至理不移，惟潜泳渊深者可获骊珠。

书系设丛书若干，收录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近期学术成

果，陆续付梓。名以“鼓浪”，寄百舸争流之厚望，存继往开来之期许。语言与世推移，文学生生不息，艺术常见常新。先哲硕果，彪炳史册；见贤思齐，人之常情。有容乃大，育才斯馨。是为序。

《鼓浪学术书系》编委会

序 言

洪峻峰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中国学术文化风尚发生很大变化,有人称之为“学术出台,思想淡化”。于是,思想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思考和争论。其中,王元化先生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的理念^①,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成为学术思想界的新追求。俞兆平教授的新著——《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即是这一追求的成果。作为一部“有思想的学术”著作,其“思想”主要体现在问题意识、研究模式和文学史观这三个方面。

首先,论析其“问题意识”。这部新著的主要内容是,从现代性的理论视野,重新分析“五四”时期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三大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和变异。但是,作者的意旨不仅在于此;他怀有更深的“问题意识”,即如何从“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中突围?这种“突围意识”在“总论”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重写文学史”这一课题,不管提出者的本意是什么,现在已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涵盖面甚广且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性口号。众多研究者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困惑。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 王元化:《〈学术集林〉卷一编后记》,《清园近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1 页。

是,“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①正是为着摆脱困境,一些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了“现代性”这个新的解释框架,并对之进行学理的探索,从而为困境中的突围寻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本书对“五四”文学思潮的重新梳理,就是要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为这一方向的突围作一次具体的尝试。

“现代性”是个含义宽泛的概念。作者在运用这个解释框架“突围”时,选择了现代性的构成要质——科学主义这一理论视角。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时期现代性话语的最重要内容,而二者相较,科学的势态更为强大。据统计,在“五四”核心刊物《新青年》上,“科学”一词出现 1913 次,而“民主”一词只出现 305 次,加上“德先生”之类的提法,也只有 513 次。^②这组统计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科学话语的强势。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始终是一种现实追求,停留在事实层面;而对科学的追求则由“器”进“道”,衍成一种精神追求、信仰追求,上升到价值层面。陈独秀提出的“以科学代宗教”说^③,便是这种追求的理论表现。科学主义的话语强势,使它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化思想领域的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层面,成为“五四”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化语境。

本书作者详细分析了这一文化语境的形成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了“五四”作家对科学主义语境形成过程中所争论问题的多重反应。这些分析和考察表明,科学思潮所涉及的论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成了“五四”作家思考的重心,左右着他们的选

①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

② 参见《〈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 年 12 月号。

③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3 页。

择方向。可见,作者在本课题研究中对科学主义这个理论视角的选择,是建立在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和“五四”文化语境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对中国现代作家思想动向的准确把握之基础上的。

其次,释解其“研究模式”。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现代性实际包含着“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种各不相同的内容,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则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本书作者对科学主义理论视角的选择,表明他更侧重于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演变,置于历史现代性而不只是审美现代性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因此,他更关注的是文学思潮变迁的历史语境这一外部因素。也就是说,本书所侧重的“研究模式”,是一种“外缘模式”;这也意味着,作者所选择的突围路线,是一条“外缘路线”。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潮史研究中,尽管流派众多、方法各异,但基本的研究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外缘模式”,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潮、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文学思潮的变迁。当年陈独秀用“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的物质一元论来解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①,胡适与之争辩,强调“多元的个别的因素”,如发动者个人的经历、古代白话作品的影响、西方文化的传入、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清廷的推翻等。^②其实,二人的思路还是一致的,即注重从外部因素来解释,遵循的都是“外缘模式”。另一为“内理模式”,它把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潮史看做一个有生命的自足的发展系统,注重从系统内部基本问题的不断解决来

① 陈独秀:《答适之》,张君勱、丁文江等著《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② 参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版,“导言”第15~17页。

揭示其演变的理路。^①后来胡适写《白话文学史》，认定中国文学自古就是往白话方向演进，把白话文运动看做这个自然进程的自觉阶段^②；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则反对这个观点，认定中国文学的演变始终就是“言志”与“载道”两种观念和潮流的消长起伏，白话文主张也只是从历史上“言志”派的“主张内生出来”的。^③他们观点虽异，但研究模式都是“内理模式”。应该说，两种模式各有长短，但对于文学史的宏观构架，尤其是对于变革时代文学史的研究，外缘模式显然更具优势。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外缘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主导模式发生了一次转折，即由注重政治（经济）影响转向注重文化（启蒙）影响。正是在这一转变中，文学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课题。目前，为了从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中突围，有学者进而提出从外缘影响返回纯粹文学自身的思路^④，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根本更换研究模式。但问题是，文学史的构架首先必须符合历史的真实。中国现代新文学本来就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新文学产生、发展、蜕变的历史，与启蒙运动的进程、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文学思潮并不独立、游离于整个社会思潮之外。显然，返回纯粹文学自身的思路难以把握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真实，运用内理模式难以完成重写文

① 参见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324～325 页。

②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8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9～152 页。

③ 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7～18、59 页。

④ 参见吴炫：《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5 期；谭桂林：《原创性的文学与文学史的原创性》（笔谈之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

学史的宏观构架。

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根本转换研究模式,而在于如何在外缘影响的思路中寻找突破。在这方面,本书除了提出科学主义这一理论视角,作一次具体的突围尝试之外,还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提供了一些思路。

本书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运用“现代性”的解释框架,不能停留于“现代性”概念的抽象定义,而应将其内涵加以展开,用其呈具体感性形态的内涵质素观照现代文学史的具体现象。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对现代性(现代)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归纳出六个基本的质素,即: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世俗化、高度的结构分殊性、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① 本书作者根据现代性的这六个内涵质素,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现代性内涵的第一个质素是“工业化”,它冲击、摧毁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模态”,并导致了技术主义的盛行。由此思考,才能领悟沈从文“以天然纯朴的‘乡土’之美为参照谱系,间接地逆向批判了现代工业、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与罪恶”,因而趋近于作为“现代性自我批判”思潮的西方浪漫主义的精神旨向;而循此路径考察周作人、宗白华、朱光潜、废名、冯至一系文人,便可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隶属于纯正的浪漫主义思潮的人物谱系。

本书所确立的科学主义的理论视角,则是从现代性内涵的另一个质素“世俗化”引出的;因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主要就表现为对“圣化社会”质疑与反叛的科学主义与民主两大思潮。从这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审视,本书澄清了许多长期未解的难题,得出了崭新的结论:在中国这一科学主义泛化的文化语境中,一方面,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104页。

科学所追求的客观观察、事实实证的原则与文学的写实主义追求在内质上的一致,促成了西方写实主义为中国文学界所接纳,并一再扩展,压倒方兴未艾的“新浪漫主义”而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潮;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在中国文学界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反科学主义内质的扬弃,使其产生了变异,仅余下“抒情”与“想象”两个质素。作者对历史语境的深刻把握和合理运用,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历史现代性这一“外缘路线”突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最后,追溯其“文学史观”。作为“重写文学史”突围的一次尝试和一个范例,这部新著在诸多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史”观念的深刻理解。

众所周知,文学史不同于文学,因此,文学史研究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史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史学的范畴,这种“史学性质”决定了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价值标准、学术方法等方面的种种不同。

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而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则宽泛得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本书作者对此十分明确,所以在“总论”中一再强调,重写文学史,“必须进入更具体的层面,如历史语境、社会心理、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团体、文学作品、创作方法、传达媒介等的研究。”文学作品当然也是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但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作品本身只是些文学质点。文学史研究重在揭示发展脉络和规律,它关注的应该是质点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在文学思潮中方得显示出来。所以说,在文学史的诸研究对象中,文学思潮更为重要。本书以对“五四”以来三大文学思潮的重新梳理作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突围尝试,可谓意味深长。

文学研究的价值标准是审美价值,而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标准则应重在历史价值。因此,运用现代性这个解释框架,应以审美现代性的观点来研究现代文学文本;但同时却应站在历史现代性的立场来观照现代文学史。这也就是本书选择科学主义这一历史现

代性视角的根本原由。

文学史的“史学性质”，决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史学方法，而不是文学方法；是历史实证，而不是文学评论、鉴赏或理论演绎。史学的基础是史实，史学方法最基本的就是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和归纳。本书作者在“后记”中便明确指出：“论述角度的展开，不能仅靠预设的理论前提演绎式地推导。这种论述方法的失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文学评论方法论的热潮中，已有过教训。特别是新的观点的提出，若不以史实为证，不是‘拿证据来’，必定寸步难行。”“因此，史实的实证、历史语境的纳入，成了本书写作所遵从的要旨。”为此，作者广罗史料，披沙淘金。书中的大量新观点，都是论从史出，因而真实可信；其中关于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的关系的论述，尤为精彩。

文学史界长期认定创造社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本书作者通过对创造社有关文献的考辨，发现其主要成员在 1930 年以前，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基本上持回避、贬斥乃至批判、否定的态度，从而对长久以来的上述结论提出质疑。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创造社仅采取浪漫主义的某些创作方法而不以其为创作宗旨，所以不能定性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或“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者此说，最初在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中提出后，便在学术界激起反响、引发争论。在这本书中，作者又挖掘了大量原始材料，甚至编制出一个“史实流程”，以难以辩驳的史实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本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和对历史实证方法的成功运用。

当前，学界掀起了关于重写文学史（尤其是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一轮的讨论。这次讨论深入到基本的理论层面，如研究模式、价值标准、学术方法、突围路线等等，但分歧颇大，争论激烈。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学史”观念的理解和把握，具体地说，

就是要真正把握“文学史”研究、写作和“文学”研究、鉴赏的不同之处。在这方面,俞兆平教授这部著作所蕴涵的学术思想,将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俞兆平，男，1945年农历七月初七生，福建省福清市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新诗美学和台港文学等方向的学术研究。已出版学术专著六部：《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诗美解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诗歌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批评的纵横》(鹭江出版社1996)，《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在《文学评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上海文学》、台湾《联合文学》、香港《现代中文文学评论》等海内外文艺刊物上发表150多篇学术论文。

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01BZW034)及省级课题项目，多次获福建省及厦门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专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获“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一名)。

曾应台湾《联合报》系、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邀请，到台、港、日本当访问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目 录

1	序言(洪峻峰)
---	---------

1	总论: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视野
---	---------------

辑一

14	科学主义的文化语境
40	写实主义思潮的科学主义脉理
83	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
122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价值选择

辑二

- | | |
|-----|---------------|
| 166 | 创造社与康德美学 |
| 195 | 创造社与马克思主义美学 |
| 218 | 科学主义与郭沫若的文学选择 |

辑三

- | | |
|-----|--------------------------|
| 234 | 思辨逻辑与史实语境 |
| 249 | 附：关于浪漫主义中的反科学主义的
几点质疑 |
| 255 | 历史意识与浪漫主义 |
| 262 | 附：“历史反思”应该具有历史感 |
| 268 | 后记 |